

## 编者前言：

# 中国农村往哪里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还是？

◇黄宗智

第一篇文章是张谦关于当今中国农业的概述。他点出了三种主要农业类型——企业农业、家庭农业和合作农业的一些特征。他强调，不同地方的政治经济环境是这些不同类型农业发展程度的关键。企业农业，即便是主要依赖其与小农户订的“契约农业”，需要当地政府的支持，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大片的土地。“商品化”的家庭农场则需要公共（专业）市场，多是地方政府所建，多处于城市近郊。合作社农业则同样需要政府的扶持，但迄今它们多从属于企业。在此篇文章中，张谦并没有试图预测未来的趋势。

我自己两篇较短的文章分别论证一个基本（而出乎意料的？）研究结果。一是最近15年以来的新时代中国农业革命的投资主体主要是小农户，而不是政府或农业企业；文章根据详细的计量资料论证小农户所做的（固定和流动）资本投入总量要远高于国家或企业。二是今天中国的社会危机的关键问题是受到劳动法规保护和具有优厚社会福利条件的正规经济的职工与没有受到劳动法规保护并没有（或只有低度）社会福利的非正规经济员工两者间的差别；根据最新的可靠资料，文章论证前者只包含全社会就业人员中的六分之一，多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特权身份的职工，而后者则包含足足六分之五，主要是农民工和其家庭的其他就业成员。合起来，一篇文章勾画的图景比较乐观，另一篇则令人担忧。

张谦和我同样认为中国今天的小规模“农场主”——而我则继续称作（商业化的）小农家庭最关心的是他们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黄宗智，2012），但我们之间有比较深层的不同。张谦与 Harriet Friedmann 等一致，基本认为一个高度商品化的农业经济只可能被资本摆布，尤其鉴于今天资本在全球所占据的压倒性霸权。而我则倾向认为，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并不一定排除其他的可能，例如合作社和国家各种社会公平工程。其实，中国近年来开始的新时代小农经济发展路径，以及城镇正规与城镇—农村非正规经济间的巨大差别，强烈呼吁国家探寻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种发展方向。张和我之间的不同其实类似于百年前列宁和恰亚诺夫之间的争议。我们俩都写过多篇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欢迎读者自己做出判断，也欢迎最关心这些问题的读者在我们刊物未来的各期中作进一步的讨论。

最后的一篇文章是张玉林聚焦于山西煤矿的研究。山西是中国的“能源基地”，煤炭产量占到全国的四分之一。煤炭采掘在当地已经造成极其严重的地质灾害，所导致的土地塌陷已经造成数百人的伤亡、数千个村庄水资源的破坏、数百万村民的饮水困难。但政府的补偿性“惠民工程”则一再拖延，最终只为部分受害人提供了部分补偿。

对张玉林来说，山西煤炭采掘案例说明的是当前的治理危机，体现于煤矿资本家和当地官员利益的结合，最终来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与中国行政体制两者的结合。正是那样的结合导致了当前的治理危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谨此邀请读者考虑参与进一步的讨论。

## 参 考 文 献

黄宗智（2012）：《小农户与大商业资本的不平等交易：中国现代农业的特色》。载《开放时代》第3期。